

解决世纪难题的中国经验

□ 张明仓

一百年前召开的巴黎和会，凸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大世纪难题”：人民生存困境、民族自决困境、全球治理困境。巴黎和会及其遗留问题，对中国既是一次面临沉重灾难的危机，又是一次迎来命运转折的契机，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巴黎和会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

解决人民生存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大浩劫、人民的大灾难。这场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覆盖33个国家、15亿人口，战争双方军队损失3270余万人，阵亡近1000万人，战争滋生的疾病蔓延更是导致5000万人死亡。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狂热好战情绪中完全失去理性，漠视人民生死，上演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大绞杀，其最大灾祸就是给民众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死亡和伤害。

巴黎和会没有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巴黎和会实际上沦为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大会，埋下了更大战乱的火种。巴黎和会不仅未能缔造世界和平，反而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1亿多军民伤亡，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一战及巴黎和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翻身解除了有坚强的领导核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先后强迫旧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境地。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对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说“不”，那么巴黎和会屈辱引发的五四运动，则表明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同时，苏俄政府于1918

年、1919年两次宣布愿意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与西方列强侵略霸道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中国先进分子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之际，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解决民族自决困境

“民族自决”是巴黎和会渲染的重要原则，却口惠而实不至。经过一战，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威尔逊将“民族自决”纳入其“十四点和平原则”。巴黎和会针对战败国殖民地建立委任统治制度，但最终只是对殖民体系的改造，难以解决民族自决问题。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一样，威尔逊最终也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妥协，这似乎再次印证了“强权就是公理”，使中国人民从其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迷梦中彻底清醒。北京大学学生讽刺说，威尔逊为他的世界新秩序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14=0”。历史学家法菲尔德认为，山东条款成为美国参议院最终否决凡尔赛和约的重要原因。

巴黎和会不公引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先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

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上升到接近16%，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解决全球治理困境

巴黎和会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未能构建和平稳定的战后国际秩序。介于近代维也纳体系和现代雅尔塔体系之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将欧洲以外强国引入国际争霸舞台，表明欧洲强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未能有效缓解列强矛盾，未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联盟，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将国际联盟看作战后国际秩序的支柱，并亲任起草委员会主席抵制《国际联盟盟约》，不料该盟约却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美国参议院两次投票否决包含《国际联盟盟约》的《凡尔赛和约》，禁止美国参加国联；而发动二战的德、意、日曾经都是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面对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的侵略行径，国联几乎毫无作为，直至名存实亡。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国联《李顿报告书》竭力为日本开脱罪责，1933年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依然没有认定日本是侵略国，只是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到“铁路区”之内。日本对此仍大为不满，宣布退出国联，国联决定被弃若敝屣，根本无法执行。随着二战爆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际体系。

巴黎和会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失调失效的历史教训，为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宝贵借鉴。在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之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为重要基

础，但仍有个别企业的增值税有少量增加，请问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军：今年4月1日实施增值税降率以来，所有行业税负都有所下降，但单算此政策，4—7月累计仍有30.6%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出现了少量增税的情况，合计增加增值税43.53亿元。对此，我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分析。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一是税制原因。由于这次增值税各档税率的降幅不一致，有的企业销项税额减少小于进项税额的减少而带来增税，占增税企业的比重为80.23%。二是市场原因。部分企业在税率下调后，仍被强势购买方以执行老合同为由，而按原税率开具发票，导致暂时性、非正常增税，占比为16.04%。三是企业主观原因。少数企业可享受但未及时或足额享受改革配套措施导致增税，占比为0.92%。四是企业申报错误原因。少数企业漏填、误填申报表而显示增税，实际并未增税，占比为2.81%。可见，少数企业增税主要是税制因素，后三个原因形成的增税，随着税务部门加强“一对一”辅导，占比逐渐下降且会进一步减少。

需要看到的是，增值税税负上升不等于企业总负担上升，评价企业减负成效要算减税降费“总账”。如综合考虑2018年增值税降率在2019年形成的翘尾减税以及其他新增减税政策，增税企业面降至16.4%；如果再进一步考虑社保降费等因素，基本上所有企业可实现

石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是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一，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二战结束70多年来，世界虽不太平，但世界大战得以避免，与20世纪上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世界人民和谐共处、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正确选择。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不走过去一些大国“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百年回首，沧海桑田。一战及巴黎和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中国人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国际社会也需要有新的“世界观”和“中国观”。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在和平发展与冲突对抗之间，在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之间，在文明互鉴与傲慢偏见之间，如何抉择将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共促世界和平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整体税费负担只减不增。

学习时报：请问税务部门将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工作？

王军：当前减税降费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要切实加以改进。税务部门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减税降费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批牢抓实主体责任，确保减税降费更好地落实落细。一是进一步加大统筹推进力度。重点抓好落实减税降费与组织税收收入、优化执法方式的统筹。坚持做到“三个务必、三个坚决”：务必把该减税的减到位、务必把该降的费降到位、务必把该征的税费依法依规征收好，坚决打击虚开骗税，坚决不收“过头税费”，坚决做好留抵退税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大分析研究力度。不断完善减税降费的“铁账本”，继续加强对少数增值税一增企业的“一对一”分析辅导，逐户算准讲清楚加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综合账”。三是进一步加大服务便民力度。持续精简表证单书，减少纳税人和缴费人资料报送，压缩办税缴费时间，力争税收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有较大提升，更好地增强纳税人、缴费人享受政策红利和服务便利的“双重获得感”。四是进一步加大税收共治力度。近年来税收共治迎来了未曾有过的良好局面。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税务部门还要更好地依靠各地区、各部门的支持协助，凝聚起更大合力。同时，继续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各方面监督，以监督促落实、促提升。

唐太宗君臣经略整合北部边疆，在充分借鉴前朝经验基础上，创造性运用怀柔羁縻手法，文武并举并用，构建了高效的防卫体系，维持了相当平稳的边境秩序，将王朝影响力推向更深远的地域，为后世经略疆域和治平天下提供了有益借鉴；特别是在边外以“胡汉一家”的思维建立实质性军政体系，不仅开创了海内治平、万邦来朝的新局面，还顺应了民族间深度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深度交流打开了通路。

把控总体局势 蓄力以谋取“先胜”

□ 丁涛

在清除内外安全威胁的过程中，着力于王朝内部强盛的同时，以武备为基本保障，不断营造对敌的绝对优势。贞观元年（627），东突厥颉利可汗因任用赵德言，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内部分崩离析，又发生天灾、用度不足的问题，太宗征询是否出兵征讨，长孙无忌认为“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由此作罢。其后，鸿胪卿郑元璁出使归唐，亲见突厥败亡之象，群臣多认为应抓住战机，太宗则言“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再次否决了出兵提议。静观其变的同时，着眼“先胜”原则，打造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先后扶助突利可汗以兄弟相约，扶持薛延陀夷男为毗伽可汗且与之和亲，促使对峙局势发生明显偏转。先有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脱离颉利可汗，后突利可汗、契丹部相继归降，至贞观三年（629），针对东突厥颉利可汗的“大口袋”已布局完成，应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伐“六状”之请，日正式筹备反击。

贞观末年唐廷决意征讨高丽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个动员过程做得非常精密。先是高丽多次侵犯新罗、百济，不仅打破了区域安定秩序，更是截断了朝贡通道，但唐太宗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及时予以安抚、积极居中调停。随后，高丽内部又发生变乱，盖苏文弄权弑杀高丽王建武，又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唐廷调解双方矛盾时，盖苏文已攻占新罗两座城池，半岛局势急转直下，后经李勣劝说，唐太宗才决意平乱。鉴于隋亡教训，唐太宗充分预估了出兵风险，变换了征兵措施改为征募天下骁勇，有效避免了因强征引发民乱的可能。此外，高度重视后勤保障，以莱州为水军基地，在乌湖岛屯备军粮作为补给基地，督造四百艘船只转运军粮。确定安州为主攻方向，以水军威逼平壤，又召命新罗、百济、奚、契丹作为策应，遇到久攻不下时，改变强攻策略，分兵抗之以待其疲敝，坚持稳扎稳打。

运用羈縻州府制度 构建安防共同体

在北疆广泛设置羈縻州府，作为拱卫北疆总体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不仅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局限和偏见，还构建了中央政权统揽、各国各族参与其中的安防模式，极大地将王朝影响力辐射周边，主要战略方向的把控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隋伏尔东突厥后，对安防体系进行了大范围重建，“东至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贞观四年（630），在伊吾七城设立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后随疆域拓展及诸部归附，平定高昌后，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646），西域各邦十余国首领来朝，置州府的规模更大，一次便设置了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幽陵府、龟林府、卢山府以及皋兰州、高阙州、鸡鹿州、鸡田州、榆溪州、隰林州、真颜州等六府七州，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后拓展成燕然都护府作为统领。

此外，充分发挥游牧民族部落擅长骑射、熟悉地缘环境的优势，多以将军任之用之，形成了有唐以来所谓“诸夷蕃将”群体，在平定叛乱、维护安定局面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贞观八年（634）征讨吐谷浑，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五路大军，调发突厥、契苾兵众以加强兵势。在此过程中，李靖分两路追击吐谷浑，其中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所率骑兵发挥了制敌关键作用，在吐谷浑国相关柱王发动反攻时，薛万均、薛



万彻遭遇围攻，为契苾所救，同时执失思力也率部击破吐谷浑于居茹川，由是二军得以会师合力大破之。追击过程中，契苾何力极力建议顺势一举击灭吐谷浑，并自率千余骑作为前锋直趋突伦川，遂得以大获全胜。再如，阿史那社尔本为处罗可汗之子，贞观十年（636）拜为左骁卫大将军，后以交河道行军总管身份参与平定高昌叛乱。其后，又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讨龟兹，连下五大城擒其王，受降七十余城，为深入经略西域树立了兵威。

以礼相待 慎用征伐

太宗对征伐手段的运用，往往也从确保天下太平、维护礼法的角度予以斟酌，而不是依仗国力军力强盛随意发动战争，较好地坚持了“先礼后兵”原则。

经略西域时，应焉耆之邀打通朝贡通道，引发高昌侵略焉耆，继而阻止西域朝贡使者入唐。随后，高昌又联合西突厥侵略伊吾，大有扰乱西域格局之势，薛延陀可汗又清出兵击高昌，于是太宗进行了布置，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与薛延陀联合，筹备征讨高昌。发兵之际，太宗仍希望高昌王文泰能够悔过而“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病不至，由此才有贞观十四年（640）发兵征讨高昌不臣之事。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夕，侯君集贯彻太宗起“问罪之师”的意图，拒绝了将领们欲在高昌王文泰葬礼上偷袭的建议，认为发兵征讨在于高昌国骄慢，并非攻城拔寨、耀武扬威，于是在礼毕之后才发兵攻城，树立了“王师”形象。

贞观二十一年（647）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继立，“浸失臣礼，浸渔邻国”。太宗为维护西域安定，特遣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管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契苾何力及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等领兵共击之，同时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联合出兵征讨。此役成功击灭龟兹国，宣明伐罪之意，后立叶护为王，归唐后太宗以原龟兹王布失毕及为左武卫中郎将，释放其手下将领那利、羯猎颠，贯彻了“吊民伐罪”“存亡继绝”主旨。

再有，对作为影响北疆总体安定局势的重要势力——吐蕃，也予以充分关照。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入侵弘州，唐太宗遣使者冯德遇予以抚慰，吐蕃赞普弃宗弄赞请婚不成，于是先后兵击吐谷浑、破党项及白兰诸羌，打破了该区域原有稳定秩序，太宗不得已以礼部尚书侯君集等出五万步骑兵击之，兵威所指迫使赞普弃宗弄赞请降并再次提请和亲，由此局面得以稳定。

